

农耕文明传承与乡村现代文化建设*

孙大鹏

摘要：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灵魂，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化特色。农耕文明的传承，不仅是对祖先智慧的继承，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弘扬。建设中国式现代乡村文化，意味着需要传承和创新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具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传承价值。近代以来，传承农耕文明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传承和创新农耕文明需要从单一的农耕文明走向农业、工业、商业文明多元发展，需要融合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需要从礼俗文化走向礼俗与契约文化并举。新时代农耕文明传承的实践进路包括产业多元发展、推进“三治合一”格局，以及做好价值引领、树立文明乡风。

关键词：中华农耕文明 文明传承 文明多元发展

中图分类号：G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4)07-0115-09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4.07.010

几千年来,华夏先民沿着黄河、长江等河流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代代传承着中华农耕文明,这一文明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深深嵌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农耕文明正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现代中国如何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并以其养分孕育和滋养中国式现代乡村文化,为回答这一问题,应当厘清中国农耕文明的内涵及时代价值,明晰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据此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

特点的农耕文明传承与建设之路。

一、农耕文明的内涵与文化传承价值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究其根源,还应该归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代代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是“大国小农”,即由巨大数量占比的农户所构成的农民大国,并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农耕文明制度和文化特点^[2]。

(一)农耕文明的内涵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以农安邦。黄帝之妃嫫祖教民养蚕于夏县,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商代

武丁时期,人们就由游牧散居转为农耕定居^[3],并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下,逐步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规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农耕文明,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天文历法——夏历的出现,反映出了我国农事活动已经由物候经验上升到历法规范;诗经《豳风·七月》则逐月详细叙述了周部落一年不同“农时”下农民有规律地辛苦劳作情景;“女织男耕;桑床满圃”,描绘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和谐分工协作图景;《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著名古代农书,记录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农耕文明贯穿中国历史,它以土地和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在分工协作中积淀和提高人们的农业生产智慧;它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提炼出人们的社会规范行为,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基础、积累交往智慧;它以乡风民约为主要手段,凝结出有效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治理智慧。农耕文明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和辐射力,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进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伦理,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与民族性格,也奠定了中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底气。

(二)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价值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华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急速跃迁,乡村人口向城市大幅迁移,村落日渐凋敝衰败。以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被矮化、被轻视,被误认为只是城市工业文明的依附。农耕文明的式微实则并非源自于自身文化的劣势,而是长期以来人们混淆了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涵和外显形式。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植于农耕文明之中,传承几千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智慧与生活美学。在不同的生产力时代背景下,农耕文明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因此,不应盲目否定农耕文明,而是

要传承赓续农耕文明的内核,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4]。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5]在新时代,中华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传承文明根脉,推动社会形态完整有效。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厚植文明根脉、推动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有严重的依赖性,劳动者需要根据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种植物种类,并及时调整种植和收割时间,避免影响粮食产量。《周礼》中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正是这些“不违天时、不夺物性”的农耕智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延续着我国农业社会对庞大定居人口的持久供养,更探索出“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等多层次的生态农业系统,有效地避免了西欧中世纪的农业地力衰竭问题^[6]。在长期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中华民族依靠农耕文明的智慧传承文明根脉,并不断加深对自然发展规律的认知,形成了顺兴天道、和谐共生的生存法则,维护了生态系统平衡,实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夯实文化基因,传承弘扬美好社会品

德。农耕文明夯实了文化基因的传承基础,传递了优秀道德品质,支撑了社会和谐稳定。首先是节庆和仪式承载了文化基因。丰富多样的传统节日和仪式,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不仅是娱乐和庆祝的机会,更是传承文化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合,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其次是乡土社会传承着众多美德。乡土社会成员间彼此高度熟悉,感情深厚,交往频繁,注重公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孟子·滕文公上》有言,“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增广贤文·上集》道:“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农耕文明精神内涵亲仁善邻、守望相助的人文关怀,历经代代相传、沿袭数千年,早已内化于我们人际交往原则中,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稳定起到重要影响^[7]。

其三,彰显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华农耕文明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交流交融、兼收并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8]中华文明是一个“散布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9]。胡服骑射、盛唐风貌、佛教东传、伊儒会通等历史事件均体现了农耕文明的开放包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始终凭借开放包容的精神气度、融同化异的坚韧特性,使文明之火从未中断。农耕文明在传承中不断彰显价值,避免了现代工商业文明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精神追求,为更好建设现代文明提供了独特借鉴视角。农耕文明对生态平衡和资源循环利用有着深刻认识,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重要借鉴;农耕文明中的传统技艺和文化元素,能够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进行赋能,提高产品质量和文化附加值。

其四,增强文化认同,培育自强不息的精神品

格。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使得农民群体能够深刻理解、尊重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农业生产受到自然风险的影响很大,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在漫长的农业实践中,广大农民养成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改造自然的坚强品格,才能战胜自然、繁衍生息。《尔雅·释水》记载了禹疏九河、改善生存和劳作环境的历史功绩;《汉书·循吏传》记载了反季节“设施农业”的建盖流程,“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王祯农书·农器图谱》记载了借助水力和风力生产的260余种农具^[10]。这些都代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奋斗精神,促使华夏儿女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发展出灿烂的农耕文明。

综上,农耕文明的传承,不仅是对祖先智慧的继承,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弘扬。它为中华民族延续了文明根脉,塑造了完整有效的社会形态,承载了勤劳、节俭、和谐、包容等优秀品德,培养了包容开放和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特质,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克服困难、繁衍生息。中华农耕文明从未在人类思想宝库中黯然失色,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必将被传承和发扬光大。

二、近代以来传承中华农耕文明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社会、文化领域也随之出现巨大的变迁。旧的封建礼治社会遭遇整体性危机,而新的乡村社会秩序又经历了几轮不同叙事话语的文化重构,这使得我国的农耕文明在近代以来呈现出断裂、破碎面貌。占据中国最广大地域、最众多人口的乡村,面临着传承农耕文明的多重挑战。

(一)经济内外条件发生变化

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携手抵御自然风险的产物。在洪水、干旱、蝗灾等灾害面前,农耕文明以村社为依托进行分工协作,开垦农田,修筑水利工程,进而长期定居,少有迁徙。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涉及多个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过程,其中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稳定”“自给自足”是农耕文明经济基础的概括。

近代以来,传统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是战争的影响。近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我国农业生产的安定环境屡屡遭受破坏。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撂荒,黄河在战争中决口并屡次改道、淹没大量农田。战争导致难民潮和人口迁移,对农耕文明稳定的土地和劳动力分布造成巨大冲击。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土地平均分配和休养生息,但由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几大农业生产要素发生剧烈变化,地权集中化、劳动力大出大进、农业支援工业建设等因素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传统农耕文明进一步瓦解。三是制度和技术的影 响。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基本逻辑,农产品进入商品市场,农业生产和流通受到市场需求的调节。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也使得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乡村劳动力。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潮汐形成,广大乡村的熟人社会逐步消亡^[11]。而技术的发展则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内部合作。技术进步的成果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减少了劳动力投入,使得传统农耕村社内部合作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农药、化肥、农机、地膜、大棚、转基因种子等新技术的投入,使农业对工业产品的依赖加剧,这些都打破了农耕文明的稳定性面貌。

(二)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出现转型

近现代传承农耕文明的另一个挑战,来自社会领域。乡村是合乎自然分配理念的人类生存共同体^[12],乡村社会治理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权力如何分配;其二,冲突如何化解。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礼治”。由传统乡村社会维持的行为规范、村社的权力秩序来自具体的伦理关系,而非某种一般性的道德原则或契约法条。

农耕文明分工简单,规定并彰显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是礼,即伦理关系及其附属的仪式规范。村社治理以具体的、人格化的宗族角色为主轴,辅以对成员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权衡。自然村社的形成往往来自于家庭成员的繁衍扩张,因此会出现同姓村或区域大姓,即宗族。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权力分配,往往在宗族内部划分,依据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加以规定^[13]。宗族由小家庭组合而来,形成具有向心力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当这个共同体之中出现冲突,由传统行为规范和生产生活知识的代表——“长老”来裁定。长老裁定的依据是农耕文明长期的稳定性,这使得知识更新缓慢,因而长期保持合法性。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小农经济,也瓦解了农耕文明社会的秩序,造成礼治方案失灵。辛亥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结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经济关系。通过土地改革,广大乡村社会平均分配了土地,形成了一个占全国人口近九成的小有产者群体。这就使得农业生产不再必然地由地方宗族控制,构筑社会关系和裁定利益冲突也不必经由长老,最终实现农民对乡村礼治秩序的去依附。随着政治权力向下延伸,中国乡村的社会组织程度不断增加,改造了以往“皇权不下县”的悬浮型治理。普通农民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生

活,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变迁,旧的农耕文明下的传统规范对乡村成员的约束力减弱。旧规范失效,新规范尚未建立之时,微观层面上乡村个体失去传统农耕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容易感到失落迷茫。映射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部分地区出现拜金、赌博、迷信、诈骗、盗窃等不良风气。乡村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也会引发利益冲突,加之传统冲突化解方案的缺失,经济利益的分化阻碍了乡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最终导致乡村共同体意识的断裂。

(三)现代工业文明带来冲击

除了源自经济基础或社会治理的内部断裂危机外,传承农耕文明还面临外在因素挑战,即工业文明的冲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变迁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迁,这就导致了文化的不协调或文化堕距(Cultural lag)现象。直到21世纪大规模投资“三农”领域之前,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都倾向于城市优先配置资源。相应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产业和文化发展不均衡,使乡村在城市引力和农业利润下降的斥力下成为生产要素洼地,大量乡村居民涌入城市,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承农耕文明生产生活的文化载体被城市文化、工商业文化不断冲击。

具体来说,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衰落状态。一方面,青年劳动力更倾向于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道路,对于农耕活动的兴趣逐渐减弱,对于农耕文化也缺乏了解和认同,很多乡村习俗、技艺和文化要素得不到传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失去了传统农耕文明的村社分工协作后,乡村地区的人情消费和仪式消费会增加居民的负担,进一步瓦解村社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新生代乡村居民开始认同工商业社会的陌生人交往方式;留守村社的老龄人口即使接受新的技术

成果(如移动互联网),但在精神层面没有内化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价值,难以与时代保持同步,甚至出现文化冲突现象^[14]。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提供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农耕文明的诸多文化要素在悠久历史中为中华传统文明稳定、繁荣、传承、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乡村现代文化建设背景下,我国应当传承和创新农耕文明,从单一的农耕文明走向农业、工业、商业文明多元发展;有机融合特殊的差序格局与普遍的团体格局;从礼俗文化走向礼俗与契约文化并举,传承农耕文明中社会关系的完整和谐、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和传统美德,塑造中国式现代乡村文化。

(一)文明:从单一到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15]加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已不仅是农产品种植和畜产品养殖的场所,农产品生产工业化、交易商业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的整体战略迎来了历史性转折。资本下乡、人才下乡、科技下乡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因此,乡村文明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探索融合农耕、工业、商业文明多元发展的道路。

与农耕文明相对应,工业文明的特点是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分工的精细,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三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工业文明也催生了城市化,带来了城镇数量猛增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大量相互陌生的人口集中,孕育出区别于乡

土社会的文明特征,从而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大发展。在追逐私利驱动下,人们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但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16]。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的才能和贡献得以释放。商业文明强调诚信的作用。市场竞争具有筛选功能,欺骗只能获得短期利益,只有遵纪守法、信守承诺、承担社会义务,才能实现长期盈利。商业文明促使长期禁锢于集体的个人主体意识得以觉醒。

传承和创新农耕文明所蕴含的逻辑之一,是从单一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即促进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相互融合。工商业文明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也带来了异化劳动问题,使劳动变得单调、机械化和无意义。“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7]商业文明解放了个人主义,但商品拜物教以符号消费的形式重新禁锢个人,使个人变成了商品的奴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受到限制,个人的价值和满足感被有意识的区别化和符号化^[18]。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人需要在劳动和消费中重拾人的完整性,传承农耕文明中人的社会关系和完整精神世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弊端,孕育出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多元文明形态。

(二)格局:从差序到团体

农耕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深受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中,“差序格局”是重要的社会结构特征之一。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立足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即珍惜土地、熟人社会、知识和文化高度保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出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以自己为中心,和別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9]。差序格局的特点包括:规范的特殊性,人们的处世原则远近亲疏有别,是一个充满关系和人情的社会;社会组织界限不清,在以己为中心的波纹状的社会关系中,血渊亲疏的差别经常投射到一切社会关系中,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家族利益、地方利益缠绕在一起,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盛行;依赖伦理纲常交往,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重血缘、重亲情、重圈子,乡土社会以伦理纲常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礼俗治理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在工商业文明下,近现代社会出现了与传统农耕文明不同的治理格局,被费孝通称为“团体格局”。“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20]团体格局事实上体现了个体主义,即个人身份平等、交往规范平等、利益平等;平等的个人依靠社会团体和社会分工,而非血缘地缘关系。这事实上就是向现代意义的“社会”的转变,是由血缘、亲族等为纽带的有机体,是依靠自然情感、共同习俗而联系起来的相互协作、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即是通过契约、制度,基于利益的驱动,依靠理性权衡而人为生成的联合体^[21]。

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有机融合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发挥各自的优点。团体格局社会更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力需求,然而,团体格局社会对个人意志、个人交往、个人利益名义上的解放,可能伴随着个人的“原子化”、人际关系淡漠、认知与利益高度分化,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体不得不依托组织参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反而形成了过度依赖组织(依附于业缘,而非血缘地缘),容易被团体利益裹挟甚至牺牲;另一方面,强大的组织在面对原子般细小的“一捆一扎”个体时,以其“权力-

知识”优势实施规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全景畅视社会”侵蚀个人领域^[22]。因此,农耕文明的传承和价值彰显,将使得个体回归乡村初级群体,来对抗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原子化,让渺小的个人获得意义感和归属感。

(三)文化:从礼俗到契约

从礼俗文化走向契约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尤其是在继承和创新农耕文明过程中,推动礼俗文化和契约文化的有机融合,更应从建设乡村现代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中华农耕文明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俗文化明确了从生活到生产等多方面的规范,如君臣、父子、夫妻之礼。儒家思想中的“礼”,蕴含着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其作为一种协调乡村社会人们的合作关系、降低社会成本的意识形态机制,作用十分重要。农耕文明中另一个协调人们合作的机制是“习俗”。习俗常表现为特定地区人们的仪式,带有多样性、神秘性色彩。习俗除特定仪式外,还包括长期留存被村民认同的制度与规范,如乡规民约及民间信仰,起到维系调节合作及竞争行为的作用。可见,“礼”与“俗”共同构成了我国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主体。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作为其重要内核之一的契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和强化。契约文化强调法律的约束力、个人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化以及市场交换的公平性,通过法律和合同来规范人们之间的关系,确保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得以平等、公正的维护。契约文化与其依托的生产生活基础高度统一,特别是与工商业文明的全球扩张契合,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随着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市场经济,契约文化似乎有全面取代礼俗文化的趋势,但契约文化绝非完美,制定、执行、监督契约的成本非常高,也无法用一张契约将当事人所有的权利义务穷尽^[23]。由于信息不对称,必然会产生损人利己的

机会主义行为。若无法克服契约文化带来的陷阱,人们的社会生活将难以正常运转。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农耕文明的价值在于将礼俗文化中那些可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精神财富应用于契约文化中,低成本地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在实践中,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是我国首批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县。他们把父慈子孝、婆媳和睦、邻里友善和犯罪状况,都纳入个人诚信指标体系中,诚信指标体系决定着每户农民是否可以贷款和贷款的数额。这是典型的传统礼俗治理和现代契约治理融合的一种尝试。它把礼俗文化的情感性、灵活性和契约文化的规范性、严肃性融为一体,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信息甄别问题^[24]。

四、新时代乡村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传承农耕文明、发展中国式现代乡村文化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应当重视产业多元发展、“三治合一”治理格局的推进,以及引领文明乡风这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发展多元产业,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需要重视其赖以存续的土壤,让乡村产业多元发展、百业兴旺、生活幸福。首先,应当把农耕文明传承、文化事业发展、乡村经济繁荣融合在一起。深入挖掘传统乡土文化,保护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恢复维修古村落、古建筑、文物古迹、农业遗迹;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特色,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如云南哈尼族梯田、黑龙江雪乡旅游等,都是利用当地地理文化特色,通过传承和开发农耕文明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其次,应当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乡村交通、供水、电力

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基建水平,推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促进农村地区与城市的互联互通。改善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为人们继承和创新农耕文明提供基本的现代生活保障。

第二,推进“三治合一”格局。自治、法治、德治合一,是有机融合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良治”答案。自治体现为通过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村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实现民主参与和自我治理。在自治的框架下,村民共商公共事务,资源共享,利益协商,逐渐打破传统的宗族或乡邻之间的差序格局,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团体和共同体意识;法治的介入使得农村社会运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以统一的法律标准对待每一位村民,减少差序格局中的特权和不公。德治通过道德教育和村规民约的制定,强化村民的集体责任感和公德。应当注重本土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的树立,以实际行动引领村民践行道德规范。“三治合一”有利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治理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和互动,逐步形成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有效结合。

第三,做好价值引领、树立文明乡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移风易俗重在常抓不懈,找准实际推动的具体办法,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绵绵用力,成风化俗,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25]传承农耕文明,需要广泛宣传农耕文明的内涵价值,如兴办农家书屋,让乡土民俗文化进课堂,举办耕读文化节和建立农耕文明博物馆等。乡村文明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勤劳、孝亲、淳朴、善良等传统美德,摒弃封建迷信和因婚致贫等陈规陋习,将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紧密结合,弘扬正气,树立新风。

农耕文明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

思想,为降低制度成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农业是国家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传承发扬中华农耕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乡村文化,有着超越农业农村问题本身的重大意义。农耕文明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洪流,将不断地演绎传承、扬弃、融合、创新和升华,相信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必将会焕发生机、生生不息。

注释:

-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08):102-123+206-207.
- [3]任继周,胥刚,齐文涛.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J].中国农史,2013(6):3-12.
- [4]《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07.
- [5][15][25]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6]隋斌.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进、思想理念及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23,(11):2-17.
- [10]郑天挺、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308.
- [7]高乐田.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三重视野[J].哲学研究,2005(09):88-92.
- [8]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人民日报,2019-09-28(02).
- [9]夏澍耘.论中华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6):91-99.
- [11]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

- 素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3(01):125-136+207.
- [12]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2012(10):87-106+206-207.
-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 [14]陈持家. 文旅资本下乡的动因、冲突逻辑与应对策略——以南阳迷笛音乐节集体哄抢事件为例[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4(02):90-100.
- [16]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193.
- [17]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0.
- [18]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 [19][20]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26.
- [21]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一个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张巍卓,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69-87.
- [22]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9.
- [23]O·哈特. 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5-27.
- [24]何广文,刘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 改革,2019(09):73-8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我国深度贫困地区扶贫领导力机制及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1BSH05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辽宁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案例研究”(项目编号:3132023312)。
- 作者简介:孙大鹏,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26。

The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ural Culture

SUN Dapeng

Abstrac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sou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mbodying the survival wisdom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cumulat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ancestors' wisdom but also the promotion of the cor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a modern rur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ies the need to inherit and innovat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inheritable value. Since modern times, the inheritanc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faces challenges from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requires transitioning from a singular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encompassing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t requires integrating differential order and group order; it requires moving from ritual culture to a combination of ritual and contractual cultures.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inherit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clude diversify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a "three-governance integration" model, and leading the civilized rural style.

Keywords: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程平)